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公共生活伦理研究

——以中国的社会转型为背景

杨清荣◎著

“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

——马丁·路德

人民出版社

公共生活伦理研究

——以中国的社会转型为背景

杨清荣◎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杜文丽
责任校对：张杰利
封面设计：汪 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共生活伦理研究：以中国的社会转型为背景 / 杨清荣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

ISBN 978-7-01-015503-6

I. ①公… II. ①杨… III. ①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中国 IV. ①B8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0944 号

公共生活伦理研究

GONGGONG SHENGHUO LUNLI YANJIU

——以中国的社会转型为背景

杨清荣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2.25

字数：380 千字

ISBN 978-7-01-015503-6 定价：69.5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这里所说的公共生活，是和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相联系的概念。它不是专指一种具体的社会（组织）形式，如市民社会、社团组织；也不是特指某一活动领域，如公共领域、公共场所等，但它又包含了上述诸方面。公共生活指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生活的新的生活样式和交往方式，即从和熟人打交道变为与陌生人交往；从固定的、封闭的空间向变动的、开放的空间转化的一种活动方式。其特点是：其一，非排他性，即是人人都是可以进入的领域；其二，公开性，活动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这两个特点和人们所说的公共领域有些相似，例如哈贝马斯说：“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场合，我们都称之为‘公共的’”^①，但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的”并不能等同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有限定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②“就形式而言，企业属于私人领域，权力机关则属于公共领域。”^③按哈贝马斯的意思，公共领域属于政治生活范畴，包括公共权力、公共舆论以及人们为达成某种共识所进行的商谈等，不在此范畴之内的都不能称为公共领域，所以他把企业和市场都划为私人领域。^④但是，

①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80页。

④ 参见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从“公共生活”的视角看，市场活动也具有非排他性与公开性的特点，它应该属于公共生活范畴。黑格尔就把市场归为市民社会的范畴，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①在这一阶段，每个人作为独立自由的个体，一方面谋取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彼此之间又发生普遍联系。“由于特殊性必然以普遍性为其条件，所以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基地上一切激情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②市场是人们满足需要体系的中介，在其中人们发生着普遍联系，这种联系就带有公共生活性质。至于企业，其内部活动固然不属于公共生活，但企业和客户的关系以及企业的市场活动也具有公共特征。这样，我们所讨论的公共生活，就是除了家庭和所有私人交往外的生活领域，它包括了所有和陌生人打交道的领域。

这样的研究视域，是基于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考虑。关于社会转型，学术界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作了阐述，大致有以下观点：(1) 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2) 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3) 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4) 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5) 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6) 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③在西方探讨现代性理论的论述中，也将古典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作了概念上的区分，如：共同社会与利益社会（滕尼斯），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涂尔干），自然经济社会与货币经济社会（西美尔），休戚与共的社会与竞争社会（舍勒）以及神魅化社会与合理化社会（韦伯）。^④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学、社会学的角度在分析社会转型，满足于以一种概念或一种社会形态来说明问题，因而更多的只是涉及社会转型的形式和结构等，还没有探讨其深层次的意义。

探讨社会转型，不能不涉及到人自身的转型问题。社会和人是两个不能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97 页。

② 同上书，第 197—198 页。

③ 参见郭德宏：《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研究评述》，《安徽史学》，2003 年第 1 期。

④ 参见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6 页。

分割并相辅相成的范畴，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的人。“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离开另一个而存在。两者从一开始即已共同在场，个人在他人的社会之中。”^①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社会的组织形式、社会关系、制度体系等都是人自身发展程度的体现。人是怎样的，人的社会生活就会是怎样的，和这种社会生活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制度等就会是怎样的。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② 这里指的是生产力状况决定社会形态，但由于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处于首要地位，因而也还是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是怎样的，其社会生活就是怎样的。因此，以公共生活伦理的眼光看，探讨中国的社会转型，应着眼于这种转型对中国人的意义，特别是对我们民族的精神气质、道德品质和国民性格等发生现代转型的意义。我们只要看看世纪之交的思想家们对转型期的国人的希冀，就能明白人的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关系了：康有为《大同书》中的“新人”、梁启超的“新民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冯友兰的“新原人”、李大钊的“青春说”等，无一不是把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寄希望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因此，将社会转型和人自身的发展结合起来考察，所揭示的意义就会深刻得多。

本书将以中国的社会转型为背景和论述前提，探讨社会转型与人的发展的双向互动，将人自身的现代转型作为其中的逻辑重点。因此，本书并不想提出一种中国社会的公共生活模式，而只是在揭示公共生活的一般形式与表征的基础上，分析转型期中国的制度变革与人的精神气质的现代转型的维度。旨在说明，一种健康的公共生活，关键因素是生活于其中的个人的精神品质，而制度不过是人的精神品质的结构化表达。因此，本书将重点揭示人的精神品质的现代转型对组建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并由此探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的重塑问题，至于制度因素，只是在和人的精神品质现代转型相关的方面进行分析。

① 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42 页。

目 录

CONTENS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转型：意义与问题.....	1
第一节 社会转型：人发展的新起点	1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转型	7
第三节 中国社会转型的伦理困境	15
一、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个人身份认同与归属感的缺失， 个人失去了伦理方位感.....	15
二、市场经济诱发的利益追求导致个人的自我实现与公共 角色认同的张力与矛盾	19
三、过度的制度依赖导致制度失效.....	23
四、公共生活的制度性建构缺乏核心理念.....	27
第二章 公共生活：一个概念的分析.....	29
第一节 公共生活与共同生活	29
第二节 公共生活与公共领域	37
第三节 市场与公共生活	42
第四节 公共生活与人的发展	49

第三章 公共生活的伦理维度	55
第一节 公共生活的伦理关系	56
一、横向的、平面的人际网络	56
二、构建性的伦理关系	58
三、契约性的伦理关系	60
四、伦理约束的非“美德”指向	61
第二节 公共生活的伦理准则	64
一、平等的权利	64
二、多元价值下的和谐共识	70
三、公共美德	74
四、诚实与正直	82
第三节 公共生活的伦理生态	87
第四章 公共生活的社会组织与个人	102
第一节 公共性社会组织	102
第二节 作为私人的个体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	109
第三节 公共生活中自由权的正确运用	114
第五章 公共生活的人际认同	124
第一节 公共生活人际认同的方式与意义	125
第二节 人际认同的精神品质	141
一、契约意识	141
二、权利与义务意识	144
三、尊重并遵守公共规则	150
四、公正与正义的理念	154
第三节 人际认同的制度环境	165
第六章 公共空间	171
第一节 公共空间的意義	171

第二节 公共权力	179
第三节 公共传媒与公共舆论	185
第四节 公共场所	192
第七章 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公共生活	205
第一节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	205
一、中国文化的自然属性产生了家国一体的观念	206
二、人的本质被道德化, 忽视或轻视人的实际能力	210
三、轻视功利, 空谈心性	215
四、儒学没有顺利向世俗化转变	217
第二节 中国的国民性问题	221
第三节 中国公共生活构建的一个视角	239
第四节 公共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制度与人	250
一、制度应向个人释放空间, 并保障个人权利的实现	251
二、制度安排与规则制定不仅应该充分听取社会成员的意见 与建议, 而且应该让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直接的参与者	253
三、界定公域与私域的界线	254
四、政府行为的榜样作用, 是培养个体的重要途径	255
五、重塑国民性格与民族精神	259
第五节 物化时代的个人	270
第八章 公共生活的本土文化资源	289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与社会转型	289
第二节 仁爱精神与超越理念	294
第三节 忠恕之道: 公共美德的推理模式	306
第四节 诚信: 人的基本德性	319
参考文献	341

第一章

中国的社会转型：意义与问题

中国的社会转型，并不是从改革开放才开始的，要说明这一点，首先必须明白究竟什么是社会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人究竟有何意义。

第一节 社会转型：人发展的新起点

社会转型一般是指社会的组织形式、结构、功能等由一种模式向另一种模式的转变，在最一般的意义上，社会转型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但是，尽管社会转型的中心词落在“社会”上，却并不意味着只关注社会形式就能实现转型的。社会是人活动的组织形式，不同的社会形式归根到底都是由人的实践能力、实践方式所决定的。这早已被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了。^①这说明，社会只是人活动的结果，它的形态、变化以及如何变化，都在根本上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的变革在根本上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矛盾。^②但是，生产力本质上是一个与实践主体相联系的概念：人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有主导地位，无论是生产工具、还是劳动对象的改进，都不仅依赖于人的生产技能，而且还依赖于人的精神品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② 同上书，第32—33页。

质。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变化，对这种变化的把握和重新组织这些关系，也要依靠实践主体的内在品质。所以，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归根到底是由人的实践活动引起的，而社会转型不过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一种形式而已。

社会转型有一个从酝酿、渐变到急剧变革的过程。西方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始于文艺复兴，经过宗教改革再到启蒙运动，最终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其间大体经历了五个世纪。在一般意义上，现代性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去理解：其一，在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开始建构世俗化的社会，建立商品和劳动力市场，并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法律体系和现代行政组织；其二，在思想文化方面，人开始运用理性考察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现代教育体系建立，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纷纷产生，知识创造和传播大规模展开并进入世俗生活。其三，确立人的价值本位，并开始确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这些特征对人具有两方面意义：世俗化一方面还原了人的生活世界，使人的生活更真实；另一方面又因为发达的市场交换使人被商品（物）所奴役而产生物化现象，人的价值可能被物的价值所贬损甚至淹没。启蒙运动赋予人们以理性，但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不仅会挤压人的精神世界，使之变得越来越荒芜和苍白，而且会由于工具理性的算计特性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充满紧张。以人的价值为本位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观念的确立，一方面使人有了价值诉求和利益诉求的渠道，但另一方面，这种价值诉求和利益诉求可能使得上述这些观念处于难以把握的状态，从而可能使这些观念难以真正落实到生活之中。例如：自由总是有条件的，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所谓的“自由”只是一种虚幻的自由，而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则是一种荒诞的自由。前者是说自由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后者是说自由必须有制度条件作为保障。这两方面的条件使得自由陷入了悖论——自由要以不自由为前提，这是现代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困境。而上述自由条件的获得，是以人们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精神品质如自律、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等为前提的。

因此，透过社会转型所展示的社会形式、结构等的改变，我们会发现，所谓社会转型，实质上乃是人自身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对人的

发展阶段作了这样的描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①我们所说的“现代社会”正处于人发展的第二阶段，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这一阶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②这就使社会具有了新的特征并使人的发展呈现出新的方式。

社会普遍世俗化导致神圣性的消解，致使某种无需论证而深信不疑的超越性信仰淡出生活世界，这是此时的第一个特征。现代社会是从世俗化起步的，而世俗化是伴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物质交换的扩展、交往关系的扩大以及人的需要和欲望被充分激发而逐渐形成的。西方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世俗化的典型标志，在这场运动中，人要把交给神的东西再要回来，恢复人的尊严，重新衡量人的价值，确立人新的生活样式，把自己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欲望、有激情的活生生的个体。随后的宗教改革则使社会向世俗化又迈进了一步。宗教改革将“救赎”从纯宗教活动变成了日常的世俗活动，从而使人的俗事俗务都成了“天职”，这使得职业化成了社会的基本要素。韦伯指出了路德宗教改革对西方社会职业化的影响。^③职业化是神圣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变的标志之一，职业既是世俗社会人们实现利益的场所，又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舍也会因此而变。“寻找天国的热忱开始逐渐被审慎的经济追求所取代；宗教的根系慢慢枯萎，最终为功利主义的世俗精神所取代。”^④在韦伯看来，职业和由此产生的职业责任不仅是由传统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所具备的基本特征，而且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② 同上。

③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页。

④ 同上书，第169页。

础。^① 在世俗活动中,职业与职业活动对公共生活的影响十分明显:职业生活与职业行为能培养人们的责任感,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事,是一种责任感;给自己的服务对象提供符合质量的产品与服务,也是一种责任。所以涂尔干说:“如果要让责任观念深入人心,我们就必须得具有持续维持这种观念的生活条件。”^② 此外,由于职业活动所锤炼的职业品质、个性、人格等需要在生活中确立起来,个人作为独立的个体也有建立某种公共性组织的要求。因此,“如果我们想在各种各样的经济职业中确立一种职业道德和法律准则,来代替支离破碎、混乱一团的法人团体的话,就得建立一种更加完善的组织群体,简言之,就是建立公共制度。”^③ 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职业及职业活动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显著标志。如果说宗教改革还只是为了让宗教信仰服从世俗的需要,那么,启蒙运动则实现了彻底的“祛魅”,最终完成了世俗化。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以理性、知识和科学为依据,使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康德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④ 当然,启蒙运动完成了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使人同时具有了现代人的精神品质,这需要在公共生活中进行历练,也需要相关的制度安排。

社会的世俗化真正开始了人的独立性进程。人的独立性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其二是指人开始摆脱各种自然形成的关系的束缚。前者表征人作为类的独立性,后者则标志人作为个体的独立性。其实,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两种独立性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当人的生产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人类社会演进到一定程度,人才不会再对神或某种未知力量产生恐惧或盲目崇拜。能使人从崇拜外力到相信自己的力量(自信)的关键,在于人确信自己具有了安顿自己的法宝——理性。理性使人具有了两

①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② 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页。

③ 同上书,第19页。

④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方面的自由，一是由于自己能独立思考而使自己避免了盲从和迷信以及由此产生的被控制和受动性（free from），二是具有可以自主地追求理想生活的能力和条件（free to）。但是，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凭借一个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实现自己的价值，并借以使自己能得到发展。在摆脱了对外部力量的依赖之后，尽管人必须也能够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但从人自身发展的意义上说，不过是改变了人表现自己生命、实现自身价值的对象，即由把神或人（某种自然形成的人的关系）作为对象转变为把物作为对象，只有实现这样的转变，人的独立性才能成为现实。因为无论是对神的依赖还是对人的依赖，神和人都不能成为客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和自己命运相关的联系，犹如一根把婴儿和母体相连的脐带一样。当人把对象转变为物之后，就把这根脐带剪断了，此时的人必须靠自己去独立地谋求生存与发展。但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独立性绝不仅仅意味着不需要依赖别人就能过上好的生活，而必须同时在思想上也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这就需要人积极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康德认为，社会上有不少人处于“不成熟”状态，“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①康德认为这种不成熟状态是因为这些人图安逸，懒得去思考，其实，其中还有很重要的原因：人以物为依赖开始其独立发展的历程，既改变了人的生活世界，又改变了人的意义世界。就生活世界而言，获取物质财富的活动已从其他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并凌驾于其他生活之上，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都要服从于物质财富的获取、分配、占有的需要。就意义世界而言，对神的信仰已不再虔诚，彼岸世界已不再具有诱惑，人的一切追求、梦想和幸福都要也都能在此岸世界实现。因此，超越性的信仰既不时髦也无必要，某种终极关怀也会因被现实需要的遮蔽而黯淡无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直接、更透亮，也更利益化。因此，人们并不是因为图安逸而懒得思考，而是因为利害的计算而过分使用工具理性，把价值理性丢在一边，把培育自己的精神

^①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3页。

品质抛在脑后，结果很可能被物所统治，这是启蒙运动没有想到的。

把物作为对象——既是占有和享受的对象，又是实现自身价值的对象——是从资本主义开始的。就人类的发展历程而言，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次解放。这种解放对个体而言意义特别明显——无论是对自然力量的依赖还是对他人的依赖，都表明个体还没有真正独立。当把这一切天然形成的关系全部斩断之后，^①个体开始原子化的同时也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身份，并由此开始人新的发展进程，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独立性是个人能得到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可见个人的独立与发展对整个人类生活是多么重要。弗洛姆也说：“从动植物种类演化角度看，人类历史的特点也可以说是一个个体化和自由不断加深的过程。人走出前人类舞台，就标志着迈出了摆脱强制本能的束缚，谋求自由的第一步。”^③这也是说，个体化是自由发展的第一步，但并不是说个体化就等同于人的自由发展。“摆脱束缚，获得自由”与积极的自由即“自由地发展”之自由并不是一回事。^④在人的独立性阶段，人在自然力方面所获得的自由度越大，人就越应该具有自我约束的能力。康德说：“人越是能够少以物理的方式被强制，就反过来越是能够多以道德的方式（通过义务的纯然表象）被强制，因而就越自由。”^⑤这说明人的自由发展逻辑性地包含了人的自律能力的提高，人的精神品质的提升，个人的自我完善。

人的独立性只是相对于以往依赖各种天然关系而言的，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没有窗户的单子”（莱布尼茨语），可以自顾自地发展自己。黑格尔说：“在市民社会中特殊性和普遍性虽然是分离的，但它们仍然是相互束缚和相互制约的。其中一个所做的虽然看来是同另一个相对立的，并且以为只有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页。

② 同上书，第294页。

③ 弗洛姆：《逃避自由》，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21页。

④ 同上书，第24页。

⑤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康德著作全集》第六卷，李秋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5页。

同另一个保持一定距离才能存在，但是每一个毕竟要以另一个为其条件。”^① 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如果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那么，个人和公众、个人与他人之间就会处于紧张状态，甚至使得社会生活难以为继。这种紧张状态如何化解——如何更顺利地实现每个人的利益、保障每个人的权利，如何使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诉求与公共性建构统一起来，是诸多西方思想家如霍布斯、斯密、卢梭、康德等所重点关注的问题。尽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契约、多元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词，但其背后则表达着某种公共性诉求，这种公共性诉求在当代思想家如罗尔斯、哈贝马斯、阿伦特等那里已上升到政治层面，成为现代性的一个深刻问题。

因此，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一方面是每个人满足自己的利益、争取个人的权利、充分发展自我的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是适应“社会”^② 生活，培养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学会自律，训练教养，历练精神品质的阶段。

第二节 中国的社会转型

关于中国的社会转型始于何时，学界一般认为，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开始，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社会转型标志着中国正在选择现代性方向，正在开始迈入现代社会。但是，中国的社会转型究竟始于何时？毛泽东有过如下判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③ 对资本主义萌芽的考察，一般是从

①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8页。

② 在严格意义上，人与人的依赖阶段是没有“社会”概念的，只有当个人真正独立之后，才谈得上“社会”，“社会”是与“个体”相对的概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若是在较宽泛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指的市场经济；若是在狭隘意义上使用资本主义（如韦伯）这一概念，则毛泽东的这一判断的确值得商榷。

生产力水平、产品的商品性、自由雇佣劳动的规模等几方面进行的。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拘泥于“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而只需看是否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即是否出现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生产目的、并具有初具规模的雇佣劳动和生产能力。有研究表明，明中叶时，在苏州、杭州等地的丝织业，广东佛山的冶铁、锻铁业中，已出现带有商品经济生产性质的手工作坊。至清中叶，江南一些地区的丝织业，陕西南部的冶铁、锻铁和木材采伐业，云南的铜矿业，山东博山和北京西部的煤矿业，四川的井盐业，山西河东的池盐业，江西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制瓷业，其他一些地方的制茶、制烟、蔗糖、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等，也已经出现商品经济的萌芽。^① 商品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和人们新的实践方式与生存方式，并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和生产方式的转变，同时也要求人们的精神需求、价值标准和精神品质也发生相应转变，而中国社会恰恰在出现商品经济萌芽的同时，中国人原有的信仰也出现了危机，发生了一场类似于“启蒙”^② 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过，这场运动并没有真正起到启蒙的作用，至多只是表达了对原有信仰体系的怀疑和对某种世俗生活的向往。不久，中国社会又重回原有的运行轨道，直到 19 世纪 40 年代。据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从明中叶开始的经济关系（商品经济萌芽）的变化以及追求世俗生活的思想解放运动，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转型的躁动期。

鸦片战争敲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警钟，也把中国社会逼到了转型的十字路口。认真分析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开始的社会转型，对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有重要意义的。在被外国列强的利炮轰开国门时，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场被迫进行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而只是认为自己国力虚弱、技不如人。由“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引发的洋务运动，未能改变中国被列

① 参见隗瀛涛、王永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贵州文史论丛》1984 年第 3 期。

② 所谓类似于“启蒙”运动，是指它并不像西方启蒙运动那样高扬理性的旗帜，并没有赋予个人独立思考的理性能力。但是在对原有信仰体系的怀疑与批判，以及对世俗生活的向往方面，则带有启蒙的特征。如李贽提出“童心”、“私心”概念，并主张个性解放与平等；黄宗羲为“自私自利”作辩护并提出“移风易俗”的主张；顾炎武对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批判等，都多多少少带有启蒙特征。